

■ 学人素描

# 张卓元：为国家发展尽经济学家天职



本报记者 史丽 摄

◎ 卢晓平 倪小林

“尽经济学家的天职”，张卓元教授年逾古稀还在身体力行这一人生信念。张卓元教授是经济学界的长者，从主要工作岗位退休之后依然活跃在研究领域，为国家经济发展尽自己绵薄之力，人们亲切地称他为“经济学的常青树”。在他近几十年的研究生涯里，特别是在他年逾六十之后，还连续多次参与中央重要文件起草工作，这些足以展现他尽天职的那份热情。

## 竭力承传师风范

张卓元教授曾经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他毕业后走进经济研究领域，不久就成为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的得力助手，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师生情”，对于张卓元教授后来的研究工作影响颇为深远。他自己总结道，我在经济学研究生生涯中与孙冶方结下了不解之缘。中国社科院经济学所位于北京市月坛北小街的一栋四层老房子二楼，我们如约来到了张卓元教授的办公室进行采访。经过张卓元教授办公室的雕塑像，那就是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塑像。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物价等问题的研究。孙冶方先生从1957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属于中科院。当时，张卓元教授只是一名年轻学者。

1959年，孙冶方先生组织经济所研究人员撰写《社会主义经济论》，点名要让张卓元教授参与写作。写这样的论著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背景下也是大胆的举动。之后，在孙冶方先生研究经济学的有生之年，张卓元教授成为孙冶方先生的重要助手。1975年，孙冶方先生获平反后，张卓元教授依然跟随先生从事经济学研究。1977年，孙冶方先生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国家为了整理挖掘孙

冶方先生学术思想成果，经济所成立了专门小组，张卓元教授和吴敬琏教授一起协助孙冶方先生整理《社会主义经济论》文稿。孙冶方先生在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孙冶方先生去世后，由一些领导同志和孙冶方的老战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科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张卓元教授后来成为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

张卓元教授是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孙冶方先生去世后，由一些领导同志和孙冶方的老战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科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张卓元教授后来成为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

张卓元教授是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承传师风学风，几乎成了张卓元教授毕生为之坚守的责任。在他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期间，张卓元教授还担任了《经济研究》的主编工作，期间他力主推荐年轻人的新作，以及那些有创意和新意的研究成果，这份杂志数十年来已举荐了众多青年经济学家的力作。由此，也足以彰显张卓元教授的人格魅力：秉承师长风范，言传身教且不辞辛劳地提携和培养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研究人才。

## 默默奉献致力于中国经济改革研究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张卓元教授从事经济研究已跨越了五十多个年头。他是广东梅县人，1954年毕业于中南财经学院经济系，1954年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后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工作。1983年7月调中国社科院财经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93年12月调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任所长、研究员和博士生导师。1995年9月至1998年10月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和《经济研究》主编。目前，他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和经济学所研究员。

当年，经济学已成为显学，很多经济学家也成为显学中的佼佼者。尽管张卓元教授在这些年的研究生涯和经历足以让他进入这个“显学”舞台，并成为知名人物，但他没有。他依然很认真地做着自己的研究，默默无闻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咨询工作。也许，这反映了老一辈经济学家更崇尚务实的研究风格。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张卓元教授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993年，他应邀参加了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当时，有不少经济界知名人物参与了那次起草工作中。

张卓元教授回忆道，当时我们一起参加起草报告的人几乎都成为中央文件起草组的成员。像今天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剑阁等。

从那一次之后，张卓元教授又多次应邀参加过多起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但他多次参与起草重要报告的事情却至今鲜为人知，有人称他是一位低调的智囊人物，这个称谓很适合平易近人的张卓元教授。虽然目前张卓元教授已退休，但他依然保持了做人的本色。

从改革开放初期开始，张卓元教授就以极大热情投入道对改革问题的研究中。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很多文章，涉及经济发展、物价、企业改革、结构调整等方面，其中有相当多的文章已出版成册。

他介绍说：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写的经济改革方面的文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坚持市场取向改革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改革；二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三是推进市场化价格改革。“早在上世

纪八十年代，他一方面为孙冶方先生收集和整理资料，另一方面他又坚持研究当时已推开的经济体制改革。1984年，当中国经济改革由农村转向城市，价格改革越来越深入时，当时对改革的速度与推进模式存在着很多不同看法。当年，张卓元教授与中国社科院经济学家刘国光、戴园晨和陈东琪等，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的名义向国务院建议中国经济改革要稳中求进。张卓元教授认为，这是他在研究经济改革中的一贯主张与观点。

后来，在经济界讨论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时，张卓元教授始终认为增长方式的转变，只有通过深化改革去解决。他认为：只有形成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体制机制，才能实现经济社会转向又好又快发展的轨道。”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张卓元教授经常是明确阐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例如，在深化企业改革过程中，至于企业改革如何改及改什么，这些问题在当时都是一些颇具挑战性的问题。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国有企业改革议题在连续几年的两会上都

有过激烈争论。当时，张卓元教授就撰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改革中虽有值得注意的问题，但是绝不能把国有企业的改革简单概括为时瓜分国有资产。他指出，二十多年的经济改革实践证明，国有经济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的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改革在总体上是成功的，这一点不容否认。

在经济体制改革期间，张卓元教授也发表了大量的理论研究成果。另外，他还花费大量心血撰写了很多报告和参考文献，这些研究成果迄今还没有问世。

说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经济研究工作，他动情地说：研究改革开放问题是中国经济学家的天职，也是中国经济学家施展才能、报效祖国的绝佳机会。”

采访张卓元教授结束后，在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时，我们又从孙冶方先生铜像前走过。此刻，老一代经济学家尽天职、报效国家的精神，让我们再次体味到了其中的人生含义，感受道了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做一名经济学家的幸运。

张卓元教授是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物价等问题的研究。孙冶方先生从1957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属于中科院。当时，张卓元教授只是一名年轻学者。

孙冶方先生去世后，由一些领导同志和孙冶方的老战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科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张卓元教授后来成为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

张卓元教授是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孙冶方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商品经济、物价等问题的研究。孙冶方先生从1957年开始任经济研究所的代所长，那时还没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原属于中科院。当时，张卓元教授只是一名年轻学者。

孙冶方先生去世后，由一些领导同志和孙冶方的老战友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科学基金会，专门用来奖励在经济学研究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年轻学者，张卓元教授后来成为孙冶方基金会的秘书长和理事长。

张卓元教授是恢复工作后，就带着张卓元教授等日夜忙于调查研究，但命运没有给这位学界老人更多时间。当孙冶方先生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张卓元教授便成为先生病榻前重要的资料收集整理者。靠着孙冶方先生的口授，张卓元教授等经过一年多时间终于帮助先生完成了《社会主义经济论》大纲约20余章初稿。

在追随先生研究的最后日子里，张卓元教授记忆很深的是那篇《二十年翻两番不仅有政治保障而且有技术保障——兼论“基数大、速度低不是规律”》一稿的形成过程。当时，改革刚刚拉开序幕，很多人对于翻两番的目标缺乏自信。1982年9月，孙冶方先生参加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要写这篇文章，从理论上阐述翻两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但由于病情恶化，孙冶方先生不得不把他想说的话交给张卓元，由张卓元教授执笔成稿，文章发表在当年《人民日报》上，不仅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受到了高层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面前，张卓元教授谈吐随和，似乎我们很难从他身上看到他曾在经济学研究领域内站在如此前沿，充当过那样的先锋角色。谈到自己过去所做的研究和现实的经济问题，他总是以最通俗的语言向我们讲述，即便是谈到当下有些人对于CPI与速度问题有些看法，但他还是心平气和地分析，一点也没有名人的做派和架子。联想到他为师长孙冶方先生所做的一切，足以看出他身上具备可堪称“大家”的那种宽和心态、奉献精神和对事业的执着敬业态度。

## 本期人物话语

中国不会出现恶性通胀

苏宁(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5月15日在出席第二届中印金融发展高层论坛时表示，当前我国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特别是物价涨幅明显偏高，但未来中国不会出现恶性通货膨胀。尽管不会出现恶性通胀，当前通胀压力仍然比较大。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仍然以防止通胀为主要任务，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根据短期状况变化适时适度进行微调。

金融市场的恢复正常

伯南克(美联储主席)5月13日通过卫星电视在比亚特兰联储银行举行的一个会议上表示，虽然金融市场动荡有所缓和，但目前的状况还远未恢复正常，如果需要，美联储将扩大各种信贷工具规模，继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美联储自3月以来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将有助于金融市场恢复稳定，特别是向投行等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提升了市场信心。为解决危机，金融机构还需扩大融资并提升风险管理能力，但这仍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完成。目前市场依然面临一定的信贷紧缩问题。

第二次经济普查方案有四变化

谢伏瞻(国家统计局局长)5月12日举行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与第一次全国经济普查相比，第二次经济普查方案有四大变化：第一，把能源和水资源消耗调查范围，由规模以上工业扩大到全部第二、三产业单位，并增加了高耗能行业通用设备情况普查。第二，对单位清查工作，加大工商、税务、质检、民政、机构编制等部门的责任和协调配合力度，制定全国统一的清查方案，采取“地毯式”清查，确保普查对象的不重不漏。第三，对个体工商户制定了统一的普查方案，确保户数和就业人数的数据质量。第四，更加重视普查员选调和培训，确保普查人员的素质。

美国经济可能面临持久衰退

杰米·戴蒙(摩根大通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日前向投资者表示，尽管当前的信贷市场危机或将结束，但美国经济仍可能面临持久衰退。抵押贷款和公司贷款市场有望在今年触底，但即使金融市场重新正常运行，经济仍可能面临长期挑战，衰退后果可能与1982年经济紧缩的严重程度一样。这种充满挑战的境况将持续到2010年，并以银行收紧银根、新一轮资产降价、银行筹集更多资本和出售资产为标志。如果这种情况真的发生，摩根大通及其在全美消费者贷款业务将蒙受巨额亏损。

重建家园：德国人讲究建筑安全

德国人对于老房子怀着很浓厚的情感，一般总是充满怜惜地尽可能

地保留。而对于新房子，他们却很苛刻，破土之前，反复讨论，反复计划，可谓智者千虑。

由于地理的原因，德国人不用担心地震的威胁，尽管如此，德国人造起房子来依然一丝不苟。人们在考虑经济实用和审美原则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安全、节能、环保、交通和整体布局。

## 经济新观察

### 企业社会责任：三大代表性理论追溯

◎ 乐嘉春

在谈论全球社会责任投资时，这一投资方式所依据的多重标准或价值观(如社会、环境、伦理和可持续发展等)，实质上反映了现代企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公司治理、环境与社会绩效、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等。这些问题又是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的主要论题。

从这个角度分析，全球社会责任投资运动发展历程是与人们或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认识的深化与发展密不可分的。可以说，社会责任投资就是贯彻和落实企业社会责任的一种投资机制。

从研究文脉追溯来看，“企业社会责任”一词最早起源于美国，但英国人谢尔顿(Oliver Sheldon, 1923)最早提出了这一概念。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有三大理论比较有代表性。

第一，主流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Classical Views)。早在40多年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1970)在《纽约时报》杂志上撰文指出：“企业仅具有一种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或者伦理习俗的社会基本规则下实现利润最大化。”确实，后来有不少研究文献试图证明企业追求社会责任与利润目标之间是相互排斥的。

弗里德曼相信，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下，市场如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亚当·斯密的著名逻辑)，会促使企业追求私利的利润最大化行为，并引向和谐(一般社会福利)的最终结果。因而，任何企业都私利地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最终会达到市场的一般均衡(或效率)。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仅局限于追求利润最大化并没有什么错误，恰恰是一种正确的选择。

尽管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仅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著名观点是有缺陷性的，但其影响却是非常深远的。

第二，利害相关者理论(stakeholder theory)。“利害相关者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企业是与相互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雇员、顾客、供应商、债权人、政府和社区)相互联系的一个结合体，它有责任和义务为利益相关者和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企业社会责任不仅仅是为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而且也要为其他的利害相关者创造有益的利益。

自从爱德华·弗里曼(Ed Freeman, 1984)在《战略管理：利害相关者理论研究》一书中普及了利害相关者思想的概念后，利害相关者理论开始被广泛传播。早期的利害相关者理论是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一种有用工具。之后，许多研究文献将利害相关者理论与企业社会责任联系起来，企业的环境被视为是改善企业与其利害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后来的许多研究又深入地试图建立起企业的“社会”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认为企业的“社会”表现应当是与其经济绩效相关的。

由此，企业社会责任被视为是企业对待利害相关者的一种行动，利害相关者理论也成为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当中非常有影响力的一种理论。

第三，三重底线理论(Triple Bottom Lines Principle)。“三重底线”最初由埃金敦(John Elkington, 1995)杜撰的一个术语，直白地说(用艾的加勒比人：21世纪企业的三重底线)(1997)一书问世后，这一术语才被广泛接受。事实上，“三重底线”这一基本概念的产生也与早期生态与环境思想密切相关，如布莱敦兰德报告(1987)和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宣言(1992)等。

这一理论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关注企业增加的经济价值，而且还要关注企业增加或破坏的环境和社会价值。从狭义上讲，“三重底线”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分析框架，用以衡量和评价与企业的经济因素表现相对应的社会和环境因素表现。从广义上讲，这一术语被用来关注企业必须陈述的一整套企业价值、企业问题和企业行为过程，以便减少任何企业行为所造成的有害效果，并创造出经济、环境和社会价值。所以，“三重底线”包含了企业的意图和考虑利害相关者(股东、消费者、雇员、合作伙伴、政府、地方社区和公众)的不同需求。

“三重底线”理论之所以能获得广泛认同，一个重要的触发点是壳牌公司和英国石油公司等跨国公司后来都沿用这一标准。

从根本上讲，三重底线“理论不是计算利益得失的一套方法，更可谓是一种哲学。任何企业行为至少应该达到经济、社会和环境三元因素(或三重底线)的基本要求，研究企业效益应从传统的“成本—效益”分析的经济层面推广到社会和环境层面，不仅要计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成本，而且还要计算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效益。如果企业按照上述要求做出的任何投资决策，才符合企业社会责任规范的要求。

确实，这一理论推动了许多企业重新定位其经济、社会和环境表现或绩效之间的相互关系，并将环境保护和社区健康等作为获得更大利润的一种有用工具。

■ 西窗听风

## 重建家园：德国人讲究建筑安全

◎ 梁雨霞

众所周知，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而遭遇过摧毁的德国，其重建速度是飞快的；但众所不知的是，对于很多老房子，德国人都保存着当初的建筑图纸，由于炮弹的破坏力主要作用在屋顶和上部的墙壁，硝烟散尽后，大批老房子在原来的根基上又得到了很快的修复。

这件事情，是笔者的一位房东库尔特告诉我的。这个朴素俭省的德国老头儿，脸上常常挂着谦卑的微笑。对自己所生活的城市，他如数家珍。在州政府大楼附近，有一个档案馆，库尔特的爷爷在二战前拥有的二十多座公寓楼的建筑图纸，至今仍保存在里面。

由于种种原因，库尔特家的房子并没有全部恢复。然而，若是综观全德境内，老房子还是有不少的。在这里，不但有零星的老房子散布在城乡，几乎每个城市都成片地保留着老社区。

德国人对于老房子怀着很浓厚的情感，一般总是充满怜惜地尽可能

地保留。而对于新房子，他们却很苛刻，破土之前，反复讨论，反复计划，可谓智者千虑。

由于地理的原因，德国人不用担心地震的威胁，尽管如此，德国人造起房子来依然一丝不苟。人们在考虑经济实用和审美原则的同时，还非常注重安全、节能、环保、交通和整体布局。

现代德国很年青，漫长的城邦历史为人们留下了无数的宫殿式建筑。公共财政不足以维护和保养众多的老式建筑，于是，很多大房子被用作政府办公楼、学校和图书馆等。不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的旧建筑，德国人很少将其视为眼中钉而一拆了之。相反，他们更乐于钻研各种改造技术，使其变得更为实用和更加节能。

德国人在改造老房子时，既尽可能地保持原状，但又注重水、电、网络和安全节能方面建设不落后于现代建筑。对于现代建筑，要衡量其品质，首要考察的，便是其安全性——尽管人们可能一辈子也用不上。

说到安全，德国巴符州有一座获得州优秀建筑的房子，是一座教学

楼。这里，每个教室都有逃生门，直接通到露天的走廊和逃生楼梯。

对严肃的德国人来说，逃生是一个很严肃的话题。警报就是命令，哪怕出现“狼来了”的谎警。警报一响，人们的第一反应必定是沿着逃生通道向外走，即使一切看起来很正常，消防警察和设备也会在瞬间呼啸而至。

事实上，在普及逃生和急救的常识方面，德国政府、学校、媒体、有关机构，乃至家庭，都形成了一道保护网。生于忧患，在这样的环境里，德国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灾害，包括自然灾害。

最近，我国四川省发生的特大地震而震撼了全世界。此刻，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亡羊补牢和重建家园，速度固然重要，但不可盲目追求重建的速度。

德国在废墟上迅速崛起，告诉我们，有效的重建速度来自于秩序，诸如节约的精神和周密的筹划等，同样也能有效地提高速度。当灾难不可避免地降临，我们会发现，在预警机制下还需补上逃生和急救一课。